

## 焦點評析

# 新瓶舊酒的美中新冷戰： 美中價值觀與勢力範圍之爭

---

Old wines in a new bottle: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value and the  
struggles of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游智偉 *Chih-Wei Yu*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Security*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 壹、前言

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上台後，美國的中國政策發生徹底變化，一般認為這個變化源於中國實力的崛起與美國霸權地位的衰弱，因而導致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然而，觀察中國的崛起過程與美國對現有國際秩序的立場變化，美中之間的衝突應為更深層的價值觀對立，這些對立先後隨著外在威脅—蘇聯的垮台與冷戰的結束—的消失、以及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與美國對中國的失望而被強化。實際上，美國的中國政策變化並非僅源於川普政府，最晚可追溯到歐巴馬政府第一任期的後半，特別是「亞太再平衡 (the Rebalance to Asia and the Pacific)」與「轉向亞洲 (pivot to Asia)」，

因而美國對中國的不滿應為長期累積的結果，並非朝夕之功，也並非美國總統川普的個人因素所致。

本文嘗試透過價值觀與制度的差異檢視美「中」近年的爭議，以嘗試釐清美「中」爭議並非僅止於川普或習近平的個人因素，也不是止於中國崛起對美國霸權地位的衝擊，而是美「中」雙方在經濟發展模式與人權等價值觀差異，而軍事對峙與外交競逐僅為雙方價值觀差異導致的表象，特別是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對民主制度的承諾、對盟國的安全保證與對自由貿易的引領，導致美「中」爭議無法避免。因而，即便美「中」近年的衝突常被稱為「新冷戰」，但實際上並未脫離美「中」關係的既有問題，而是在冷戰結束與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使得美「中」雙方在價值觀與制度上的差異被進一步凸顯。

## 貳、新瓶舊酒的美中新冷戰

### 一、美中價值觀之爭：經濟發展與人權

#### (一) 經濟發展模式：自由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對立

2017年8月14日，美國總統川普授權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調查中共對技術轉移、智慧財產權與創新的作法。<sup>1</sup> USTR於2018年3月22日發佈調查報告，指出中共長年以來對智慧財產權的侵犯、對外資所有權的限制、與商業間諜行為及對智慧財產權的剽竊造成美國在美「中」經貿關係中的弱勢與不平等。<sup>2</sup> 雙方雖於2018年5月一度達成和解，但最終破局，白宮於5月29日的正式聲明指出，除非中共

---

<sup>1</sup>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4,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memorandum-united-states-trade-representative/>.

<sup>2</sup>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

解決智慧財產權的竊取問題，否則美國將對價值 500 億美元的額外中國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因為《2025 中國製造》政策傷害美國產業、中國對美國進口商品的關稅高於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中國禁止美國農產品輸入、中國對美國市場傾銷。<sup>3</sup>

觀察美國官方報告的內容，雖然美國相當不滿美中貿易的逆差，但更重要的卻中國對外國企業設下的貿易障礙，例如關稅、補貼、對外資所有權的限制等，以及強迫赴陸投資的企業必須轉移技術與專利，而中國大陸對智慧財產權的法律保障與體系又不足。而美國的不滿大致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容相關，中國透過政府補貼、無息或低利貸款等方式強化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並要求在陸投資的外資必須與陸資成立持股低於 50 % 的合資公司並轉移相關技術、以及透過網路或商業間諜等方式竊取智慧財產權或侵犯個人隱私，這些行動的背後均有中國政府的支持，也是引爆美中貿易戰的關鍵因素之一。

## （二）人權議題：個體權利與集體權利的對立

另一方面，在人權議題上也有相似現象，但卻更為複雜。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屢屢公開批評中共的香港、新疆與宗教政策，美國財政部以嚴重侵犯人權為由，先後以新疆為由制裁大陸企業、援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制裁包括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在內等多名官員與其直系親屬、<sup>4</sup> 以及以侵犯香港自主性為由，援引《香港人權法》與《香港自治法》制裁香

---

<sup>3</sup>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s Confronting China’s Unfair Trade Policies,” *the White House*, May 29,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confronting-chinas-unfair-trade-policies/>.

<sup>4</sup> “Treasury Sanctions Chinese Entity and Officials Pursuant to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July 9, 2020,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1055>.

港特首林鄭月娥等多名官員與其直系親屬。<sup>5</sup> 而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屢在記者會上反擊美國的制裁為干涉中國內政、破壞新疆穩定、抹黑中國治疆政策。

實際上，中共與歐美國家在人權議題上的對立由來已久，此係源於雙方對人權的觀點不同，更源於中共傳統上對「和平演變」的憂慮。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中共認為人權並非天賦，而須經過階級鬥爭而生，<sup>6</sup> 也是階級的集體權利，<sup>7</sup> 個體必須服從社會集體的意志，<sup>8</sup> 而國家的主權則高於個體的權利，因為唯有國家保障主權，個體的權利才能得到保障。<sup>9</sup> 相反地，歐美國家則從天賦人權為出發點，肯定個體權利高於集體權利，而當人權遭到不義侵害時，以義戰為核心的人道干預便有其必要性。<sup>10</sup>

其次，1980年代中共便相當在意歐美國家推動「和平演變」的可能性與顧慮，而這個傾向迄今並未改變。鄧小平於1980年代中多次指出歐美國家正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sup>11</sup> 以人權為藉口的干預內政為最需留意之處。<sup>12</sup> 而習近平上任後也曾在內部會議表示：「西方國家的戰略計算從未改變……也不會接受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我們）和平發展」。<sup>13</sup> 中共領導人的

---

<sup>5</sup> “Treasury Sanctions Individuals for Undermining Hong Kong’s Autonomy,”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ugust 7, 2020,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1088>.

<sup>6</sup> 許崇德，《人權思想與人權立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頁25。

<sup>7</sup> 夏曉明，〈簡論鄧小平的人權思想〉，收錄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巡禮》（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189-1202。

<sup>8</sup> 王壽林、張美萍，〈論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5期，頁12-14。

<sup>9</sup> 李林梅，〈主權原則與人權的國際保護〉，《外交評論》，1992年第1期，頁49；肖劍秋，〈從三個維度看鄧小平的人權思想〉，《黨政論壇》，2007年7月號，頁8-9。

<sup>10</sup> Andreas Krieg, *Motivations for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siderations* (Heidelberg: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4), pp. 20-21.

<sup>11</sup> 王英烈、唐家柱，〈鄧小平對毛澤東反霸權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社會主義研究》，1999年第4期，頁53-56。

<sup>12</sup> 張雪梅，〈鄧小平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認識〉，《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1999年第3期，頁19-24。

<sup>13</sup> Maochun Yu, “Marxist Ideology, Revolutionary Legacy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Security Policy,” in Lowell Dittmer, Maochun Yu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a’s Security* (New

論述相當程度地反映出其與歐美國家，特別是在民主制度與人權議題上的差異、以及渠等對歐美國家的戒心。

## 二、美中勢力範圍之爭：軍事對峙與外交較勁

### (一) 軍事對峙：和平地理的侵蝕與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對峙

Robert Ross 於 1999 年的《和平地理：21 世紀的東亞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文中，指出即便冷戰結束，美國（海權）與中國（陸權）在東亞的二元對峙依然維持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劃分與聯盟關係，前者包括美國與日本、南韓及臺灣的同盟關係與安全合作，後者包括中國與北韓的軍事同盟與意識形態。<sup>14</sup>

然而，東亞的冷戰結構或 Ross 所稱之和平地理卻因北韓的核武化、中國的崛起與北京日具侵略性的政策而被逐漸侵蝕，這也導致美中在東亞地區的對峙態勢逐漸升高。北韓的核武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朝鮮半島的穩定與南北實力對比，同時也引發東北亞各國核武化的期待，例如若日本認為美國的安全保證不足以信任時，日本便可能追求持有核武，<sup>15</sup> 這也導致美國與北京必須合作處理朝鮮半島的無核化，但這些努力最終未能阻止北韓持有核武，因而導致南韓重新思考安全政策的依靠與屏障。

其次，中國的崛起與日具侵略性的政策則挑戰了美國定義下的區域現狀，中共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抗議與海峽中線的否定是很好的案例。美國於 1970 年代移交沖繩主權時一併將釣魚台列嶼的行政管理權移交予日本，而即便台北與北京不斷抗議，但兩者並未有實際行動，但這個趨勢在胡錦濤的末期被破壞，而在習近平上台後則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又被稱為戴維斯線 (the Davis Line) 的台海中線則是另一個更好的案例，除解放軍的軍事行動與訓練

---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5), pp. 45-46.

<sup>14</sup> Robert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4 (1999), pp.81-118.

<sup>15</sup>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Issue 4 (Spring 2020), p. 82.

近年屢屢跨越台海中線之外，近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表示並不存在台海中線，對照過去中共的軍事行動鮮少跨越台海中線、中共外交部未明確表示對臺海中線的立場，中共正嘗試以實際行動挑戰美國定義下的區域現狀。

實際上，中共綜合實力的崛起與侵略性日高的政策從根本侵蝕了東亞的冷戰結構與 Ross 所稱之和平地理，而這也反過來觸發美國與周邊民主國家的同盟反應，導致民主與威權國家的勢力範圍之爭、並強化了以自由主義為核心之國際秩序的內在缺陷。中國的崛起與對區域現狀的侵蝕導致周邊國家的警覺，而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強調以內在團結應對威脅的價值，將使盟國之間必須忠誠履行義務，而自由主義無法因應的地緣政治現狀反可能導致秩序的崩潰。<sup>16</sup>

## （二）外交較勁：國際組織人事的競奪與政策議程的左右

另一個美中強力對峙的議題則是國際組織官員的選舉與人事安排。近年中國大陸出身、在聯合國所屬之功能性國際組織擔任重要官員的人數越來越多，包括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屈冬玉在內共有 14 名大陸籍人士擔任重要官員。<sup>17</sup> 隨著中共對國際組織（特別是功能性國際組織）影響力的上昇，美國的不滿也逐漸提升，特別是在 COVID-19 疫情中，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表現與美國的批評，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美國對中共與 WHO 的不滿。

實際上，中共在國際組織擴張勢力與強化主導政策議程的能力早在 2005 年前後便有跡可尋，當時對中國究竟是現狀支持者或修正主義者的辯論中，

---

<sup>16</sup> Charles L.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Issue 4 (Spring 2019), p. 85.

<sup>17</sup> 這些人員包括：世界氣象組織副秘書長張文健、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楊少林、世界銀行副行長兼司庫華敬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副秘書長王彬穎、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柳芳、國際海事組織理事會主席張曉傑、國際貨幣基金副秘書長張濤、國際農業發展基金助理副秘書長 Guoqi Wu、國際電訊聯盟秘書長趙厚麟、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秘書長李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執行長祝善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秘書長曲星、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合作聯絡辦公室 Hak-Fan Lau。

認為中共為修正主義者的研究雖承認中共當時對典則的支持，但也提醒北京嘗試強化影響力或稀釋美國的決策權，<sup>18</sup> 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是很好的案例之一，中國強化與區域大國的合作以對抗美國與其盟友（特別是日本）的方案。<sup>19</sup> 而北京更長遠的可能目標則為修正典則的核心價值與規章，<sup>20</sup> 中共對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很好的例子。<sup>21</sup>

然而，在美中在國際組織的較近與互動中，美國在安全與財政領域的國際組織中仍佔有相當程度的優勢，但北京逐漸在攸關民生的功能性組織中取得優勢。就前者而言，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影响力仍相當穩固，因為美國在這三個國際組織擁有制度賦予的否決權。就後者來說，近年出任國際組織重要官員的陸籍人士多任職於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轄下的功能性國際組織，但後者對各國市民社會與企業的影響力與渠道遠高於前者，也在無形中賦予北京影響各國社會與企業的機會。

---

<sup>18</sup> William Walker, "The Trouble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Nuclear Order," in Chandra Chari ed., *War, Peace and hegemony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Y.: Rutledge press, 2008), p. 57.

<sup>19</sup> Andrew Hurrell,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January 2006), pp. 15-16; Steven Chan, "Soft Deterrence, Passive Resistance: American Lenses, Chinese Lessons," in Davis B. Bobrow ed., *Hegemony Constrained: Evasion, Modification, and Resistance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8), p. 71.

<sup>20</sup> Ian Clark,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Succession of Hegemon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1 (January 2011), pp.18-19; Kevin J. Cooney, "Chinese- American Hegemonic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A New Cold War or into the Arms of America?," in Kevin J. Cooney and Yoichiro Sa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merica and Asia respo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pp. 38-59; Masako Ikegami, "China's Grand Strategy of 'Peaceful Rise': A Prelude to a New Cold War?,"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and Cheng-Yi Lin eds.,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9), pp. 42-45.

<sup>21</sup>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4 (July/August 2008), p. 65.

## 參、美中新冷戰的原因與理解角度

### 一、美中新冷戰：價值與制度之爭

自 1992 年出現中國威脅論的主張後，美「中」之間的競爭與對峙從虛幻走向現實、從學術討論的可能性走向政策研究的實際議題，但貫穿近 30 年的關鍵概念仍是美「中」對價值與制度的不一致、以及因此無法有效提升的互信與有效作用的經濟互賴。

在制度上，中國以國家資本主義為核心的經貿制度與美國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貿制度更顯得格格不入。在中共的實踐中，政府強力保護國有企業，<sup>22</sup> 政府也強力地協助國內企業對抗國外競爭者，<sup>23</sup> 同時國家也從上至地主導經濟體制。<sup>24</sup> 相對地，美國對自由貿易的期待、市場法則的期待與遵守在二次大戰後並未有任何變化，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期待非民主國家與國際社會的互動增加、以及經濟蓬勃發展後，得以產生全新的民主政體、或接納國際社會的規則。

在價值觀上，中國以集體為優先的價值觀與歐美以個人為優先的價值觀格格不入，導致雙方的溝通效率與互信深度不如預期。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歐美國家的互動經驗賦予中國民族主義成長的養分，而中國共產黨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與實際的政策操作更進一步深化了民族主義對歐美國家的不理解，進而造成中國大陸在優先考慮集體利益的條件下，可犧牲個人權利的價值。然而，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主流的價值觀卻與此完全不同，更著重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個人權利，這樣的差異反可能導致隨著互

---

<sup>22</sup> Mary E. Gallagher,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in Benjamin L. Liebman and Curtis J. Mihaupt eds., *Regulating the Visible Hand? The 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State Capit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36-237.

<sup>23</sup> 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Who 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 (New York: Portfolio press, 2010), p. 140.

<sup>24</sup> Kellee S. Tsai, "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 Political Diversity among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China," *Issues and Studies*, Vol. 51, No. 1, p. 66



動的頻率與深度增加，彼此的誤解與歧見反而更深。

最終，美國對中共保守價值觀的再認識導致美國對中國政策—不論是交往、圍堵或暨交往又圍堵—的反思。Kurt M. Campbell 與 Ely Ratner 於 2018 年在《外交事務》上的長文反應了美國傳統紅隊對中國政策的失望。兩人均曾在歐巴馬政府時期任職，相較於共和黨人，渠等對北京的立場原更為溫和，但在該篇文章中卻歷數了美國中國政策的期待與失望，中國對國際秩序的質疑，以及成立新的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或倡議，包括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與帶路倡議（BRI），並在不挑起軍事衝突的前提下，嘗試改變區域現狀，而這些均與美國自冷戰期間開始接納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一員的期待相左，美國原希望藉增加中國與歐美國家的互動，使其展開民主化與自由化的路徑，但北京因天安門事件與蘇聯解體的經驗使其恐懼民主化與政治競爭，並堅持與歐美國家—特別是美國—不同的價值觀與發展模式。<sup>25</sup>

而 Campbell 與 Ratne 的觀點也反應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Joe Biden）對中國的立場上，拜登於 2020 年 3 月在《外交事務》期刊上的論點相當清楚地呈現了其可能的外交政策與中國政策：修補美國與傳統盟邦關係、透過外交對話或國際組織的介入與多邊談判處理區域衝突、要求中國停止補貼出口、掠奪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停止透過帶路倡議出口污染與財政困境予其他國家、與國際社會合作對抗中國對人權的戕害與侵略行為等。<sup>26</sup> 實際上，拜登從 2011 年—甚至是 1979 年拜登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到 2020 年對中共態度的變化反應了美國知識社群對中國政策的失望與對中共態度變化的原因，原寄望於增加互動與良好的經濟發展前景以改變中國大陸內在的意識形態—不論是民族主義或共產主義，但實踐的結果卻反而成就中共挑戰美國霸

---

<sup>25</sup>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7, Issue 2 (March/April 2018), pp. 60-70.

<sup>26</sup>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7, Issue 2 (March/April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01-23/why-america-must-lead-again>.

權與領導地位的能力。

## 二、理解美「中」新冷戰：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理解與不足處

綜言之，美「中」新冷戰反應著美「中」雙方在價值與制度的差異，以及中國崛起對當代體系權力結構的衝擊，隨著中共綜合實力的提升，美「中」在價值觀與制度上的差異也被逐漸凸顯，與美蘇冷戰不同之處在於美「中」之間的經濟互賴遠高於冷戰時期的美蘇，而當代國家綜合實力的估計也遠較冷戰時期複雜。因而，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對美「中」冷戰的解釋與預測。

一方面，現實主義從結構著手探討美「中」衝突的可能性，但卻也對綜合實力的估計提出不同觀點，而美「中」互動的過程與結果則取決於雙方對彼此實力與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認知。從綜合實力的估計來說，科技的進步導致國家更難以輕易地將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而因中國大陸的科技較為落後、同時多仰賴美國企業的技術與專利，因而即便中國崛起為正在發生的事實，但仍不足以撼動美國的霸權地位。<sup>27</sup> 而另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則是二次大戰後武器系統的複雜度呈指數成長，導致解放軍很難在短期內追上美軍的實力。<sup>28</sup> 另一方面，雖然結構現實主義與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美「中」衝突係由美國引發，但卻未能進一步解釋為何中共不滿意現狀，因為自 1978 年後迄今，中國大陸從現行體制中獲得的利益應為所有國家之冠。

另一方面，美「中」之間的經濟衝突似乎正在挑戰了複雜互賴的概念，美「中」之間曾有多種聯繫管道，而在川普上任之前，即便美「中」之間有

---

<sup>27</sup>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Issue 3 (Winter 2015/2016), pp. 7-53.

<sup>28</sup> Andrea Gilli and Mauro Gilli, "Why China Has Not Caught Up Yet: Military-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and the Limits of Imitation, Reverse Engineering, and Cyber Espiona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Issue 3 (Winter 2018/19), pp. 141-189.

不少爭議，但議題之間的階層性並不明顯，同時軍事力量也不是美「中」雙方處理爭議的主要手段。然而，隨著川普上任後，美國的中國政策日漸強硬，同時雙方溝通管道的數量與質量也逐漸降低，而軍事行動逐漸成為雙方的主要政策。也許論者認為美國的變化源於川普的個人性格，但對照拜登於2020年3月對其外交政策的論述，民主黨/拜登可能也傾向將北京視為戰略對手，而不僅止於競爭者。若果，值得討論的問題便是為何美「中」長期深厚而繁榮的經貿關係無法制約雙方關係的惡化。

## 肆、結論

綜言之，美「中」關係的惡化與趨勢短期內恐怕很難逆轉，因為雙方關係的惡化源於長年以來對彼此意圖與價值的不理解，而隨著冷戰的結束與中國崛起，這些不理解逐漸成為誤解或爭議的原因，進而成為惡化雙方關係的養分。美「中」雙方在制度上的差異導致雙方的爭議為隨著經貿交流的增加與複雜互賴程度的加深而有所減緩，而美「中」在價值觀上的差異則進一步導致原屬於可控議題的爭議—例如人權—昇華為衝突的核心議題之一。

然而，位處兩強夾縫中的東亞各國面臨的困境更為險峻，隨著美「中」對峙程度的提升，東亞各國過去經濟上倚賴中國、政治與安全上倚賴美國的戰略將從根本被侵蝕，東亞各國面臨的選邊壓力也將逐漸提升。一方面，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念茲在茲的日本與臺灣面臨的壓力可能將是東亞各國之最，前者帶給中國百年恥辱，後者則為列強分裂與侵略中國的活證據，而在民族主義為中共執政重要基礎的條件下，中共步步進逼的可能性也就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東亞現狀係建立在美國強大實力與安全保障之上，若美國選擇拋棄特定盟友，可能將導致連鎖效應，除可能加劇東亞軍備競賽外，美國更可能面對其他盟友的背叛，加速東亞現狀的崩解。

